

河南公众考古的整合实践

——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系列活动回顾与启示

李朝阳 曹凌子 李琳娜 李梦伊 牛维

2025年，恰逢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这座被誉为“早期中国”核心都邑的考古发现，自1955年面世以来，持续为我们揭示着商代文明的辉煌图景。以此为契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了贯穿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积极联合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丰富活动内容及形式。这些活动不仅是对70载考古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展示，更是在公众考古领域开展的一次多层次、立体化、系统性的传播实践，形成了河南公众考古颇具特色的“郑州商城模式”，为新时期文化遗产的大众阐释与社会共享提供参考。

构建多层次阐释体系，推动考古成果转化

公众考古的首要环节，在于将专业、艰深的考古学知识，转化为社会公众可理解、可共鸣的文化叙事。此次系列活动着力构建了一个从学术源头到公众认知的完整阐释链，确保传播内容兼具权威性、系统性与可接受性。

首先，以学术研讨会确立阐释基石。“郑州商城与早期国家文明暨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系列活动的“压舱石”，此次会议汇聚国内外240余位学者，围绕都城性质、规划布局、青铜文明、手工业体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这场高规格的学术盛会，为整个纪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确保了后续公众传播在史实与观点上的准确性与前沿性。

其次，依托学术出版与期刊专栏系统呈现研究成果，构建起层次分明、内容坚实的知识传播体系。《华夏考古》期刊设立了郑州商城专题，集中发表了一批涉及城墙、手工业遗存、动植物考古等最新研究成果的简报与论文；《中国文物报》《河南日报》从文明价值呈现、考古成果解读、历史脉络考证等方面对郑州商城70年的考古历程进行了深度阐释；规划出版《2025华夏考古讲坛文集》，固化讲座成果，推动知识共享。这些出版物构成了深度阐释的核心文本，满足了研究者、学生及历史爱好者的进阶需求，承担起知识传承的长远使命。

最后，通过讲座与短视频实现考古成果生动转化。“华夏考古讲坛”系列讲座邀请专家学者，面向公众解读郑州商城的历史价值与文明意义；“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专家说”系列科普短视频，以轻量化、可视化的方式，在新媒体平台传播，降低了知识门槛，增强了传播亲和力。

拓展立体化传播路径，提升公众参与体验

在丰富阐释内容的基础上，活动通过线下体验、视觉叙事与线上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拓宽传播渠道，提升公众参与感。

线下活动注重沉浸体验。考古的魅力在于其现场性与探索感。系列活动特别设计了考古研学项目，组织中小學生走进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操作手铲、辨识地层、清理

“遗物”。此外，考古工地开放日让普通市民得以近距离观察发掘现场，了解考古工作的科学流程与艰辛日常。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大地消解了考古的神秘感，将公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参与者，在亲手触摸和亲眼见证中，建立起对文化遗产最直接、最深刻的情感联结。

为拓展线下传播阵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别改造院外宣传橱窗，推出“考古复原城市生命史”专题展，展览以“地、天、礼、食、住、行”六大板块，系统梳理郑州商城的地理环境、礼制文化、生活图景等，并辅以“郑州商城发掘保护大事记”时间轴，清晰呈现70年来考古历程。橱窗设计图文并茂、视觉直观，成为面向公众长期展示郑州商城成果、传播考古文化的重要窗口。

视觉叙事，用展览与影像讲述文明故事。2025年9月开幕的“国宝回家乡——纪念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考古新发现展”，展出近500件（套）文物，其中大量为首次展出，通过“王都赫赫”“明礼于器”“广域四方”等六大单元，系统勾勒出郑州商城作为早商王都的壮阔图景。展览创新运用仓储式陈列、数字化互动、场景复原等手段，使文物“活”了起来。同期推出的宣传片《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则以气势恢宏的航拍镜头、河南考古队员的工作纪实与学者的深情解读，在十分钟内凝练呈现郑州商城的核心价值与时代意义，极具情感冲击力与传播力。

线上平台助力全方位传播。在数字时代，线上平台是扩大影响力的主战场，活动主办方充分利用“河南考古”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网站等自有阵地，进行讲座预告、展讯推送、成果发布和短视频投放。同时，积极与新华社、人民网、大象新闻客户端等相关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扩大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话题影响力。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多平台、分众化的内容投放，形成立体传播格局。活动共发布宣传报道100余篇，曝光量超800万次，覆盖受众人次达千万级别。

强化系统性整合策略，实现全域协同增效

系列活动的突出之处不仅在于单项活动的精彩，更在于其通过顶层设计，将各类资源与环节有机整合，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使各类活动彼此呼应、形成合力。

内容整合，确保价值传递的一致与深化。公众传播内容均源自学术研讨会确立的权威框架，并沿着“从学术成果到专著论文、再经讲座报告延伸至展览观影、最终转化为新媒体短讯”的链条，实现内容的逐级转化与形式适配。这保证了从严谨专著到轻松短视频，核心信息的一致性与准确性。同时，不同形式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专著满足深度需求，展览提供直观体验，讲座进行系统讲解，短视频引发碎片兴趣。公众可根据自身兴趣，在不同产品间自然导流，形成递进式的认知深化过程。

渠道整合，构建闭环联动的传播生态。活动

打破了线上与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壁垒，既有临时阵地，又有长期窗口。在学术研讨会与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考古新发现展期间，郑州市核心地带的东大街商都巨幕上持续亮起“纪念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的巨幅主题海报，醒目目标语与极具商代文化特色的视觉设计，共同构成了一道震撼的城市风景线；考古院外宣传橱窗的专题展览，成为长期、固定的线下宣传窗口；社交媒体负责造势互动与精准引流，传统媒体则提供深度报道，确立活动基调。最终构建起“传统媒体定调、网络媒体扩散、社交媒体互动、线下实体承接”的全渠道、立体化传播网络，使得活动影响力持续发酵，形成了长效的文化记忆。

受众整合，实现分层覆盖与精准触达。活动目标受众进行了清晰分层，并匹配差异化策略：针对学界同仁，重在通过研讨会和期刊进行深度交流；针对文博爱好者与考古迷，“华夏考古讲坛”和专题展览提供高质量知识盛宴；针对普通市民和游客，依靠宣传片和社交媒体的轻量化内容激发兴趣；针对青少年群体，则通过模拟考古等体验式活动进行启蒙教育。这种精细化运作，使有限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实现了从专业圈层到社会大众的有效覆盖。

公众考古的整合实践启示

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系列活动，是一次成功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公众考古整合实践。它超越了单一、零散的宣传活动模式，通过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将价值阐释、多元传播与资源整合三者紧密结合，构建了一个逻辑清晰、执行高效、受众广泛的公众考古运作体系。

这一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的公众考古工作：其一，必须坚持学术为本，所有大众化传播都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确保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其二，必须树立用户思维，深入研究不同受众的需求与习惯，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内容产品与参与方式；其三，必须强化整合意识，统筹规划内容生产、渠道布局与受众连接，使各项活动相互支撑、形成合力。

此次系列活动所展现的系统思维与创新精神，不仅有力提升了郑州商城本身的社会认知度和文化影响力，也为如何讲好中国考古故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从郑州商城出发，河南公众考古正在不断探索着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的实践路径，为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提供了坚实的在地样本与时代回响。未来，期待这种整合性的公众考古理念能在更广阔的遗产地实践中生根发芽，为增强全民族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贡献更为深厚的文化力量。

【本文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河南公众考古阐释与传播研究”（2025HKYJKY40）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市）是西汉南越国的核心区域，其社会融合结构是南越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诸多不同层面综合而成的架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手工业生产是与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相关联的。综合利用目前所见的考古学资料，包括墓葬、城址、青铜器铭文、官署遗址、手工业遗存、水井、木简等各类遗存，考察南越国的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社会生产和分工、基层社会组织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历史及考古学界对西汉南越国社会结构的认识。

族群构成上的交融共生

综合南越国墓葬和青铜器铭文两类材料，可大致勾勒出西汉南越国的族群构成总体情况：主体人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移民（或称南下汉人），一类是百越支系（或称越系人群）。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除了中原南下汉人和土著越人以外，还有不少次生越人以及已经汉化的越人群。

西汉南越国南下汉人墓地和越人墓地在空间分布形式上呈现出共同的规律：单纯的汉人墓地和以汉越融合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远远多于单纯越人墓地，以汉越融合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虽然多，分布集中，但规模相对不大，如淘金坑墓地最新勘定的范围达10000平方米。越人墓地数量虽少，但分布较为集中，墓地规模相对较小。越人墓地和南下汉人在空间分布形式或丧葬习俗上存在差异。在单纯越人墓地中，其墓葬年代基本都跨越春秋至战国时期，部分至西汉初期，如槐园岭遗址、沙岭遗址第一期遗存、跛头岭墓地、覆盖顶岭遗址等。与之相关联，在汉越融合为主体的“次生墓地”中，如瑶台柳园岗墓葬群，墓葬年代集中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多数越人墓地年代也相对较早。说明西汉前期南下汉人和本地越人墓地相互融合，西汉前期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共同埋葬于同一墓地，墓地形式的变化，反映出本地越人与汉人的融合过程。

南越国汉越融合墓葬特征在西汉时期发生过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墓葬特征又恰恰都是“汉式”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方面。与此同时，能够辨识出来的越人墓葬数量相应减少，这一现象应该与土著越人丧葬习俗的转变有关。在与汉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首先发生融合转变的可能是地方土著中的上层贵族，他们接受了中原汉人的器用制度、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岭南地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汉越融合墓葬等级呈现升高的现象，说明此时接受汉文化的很大部分是中上层贵族。在“礼不下庶人”的历史背景下，统治阶层埋葬习俗的转变新风尚提倡显得更为迫切。墓葬中流行多室木椁墓，随葬铜镜、“半两”钱、鼎、盒、壶、钫、汉式礼器组合，铁生活用器等汉式习俗。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发现的墓葬、城址、官署遗存、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材料证明，西汉南越国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层。西汉南越国主体人群分为土著越人和南下汉人，不同族群在身份层级以及彰显身份层级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从动态发展上看，西汉南越国的阶层流动和重组现象已经发生，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汉人和土著越人墓葬等级整体上存在消长变化，土著越人墓葬等级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二是土著越人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特征逐渐减少或消失不见，如墓底局部铺垫小石子、器物原形精美的羽人纹饰、使用靴形青铜镜、仿中原原始瓷甗等标识越族遗民身份的习俗，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后经历了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不见的过程。岭南地区西汉前期的越人墓葬中，不再随葬仿铜陶礼器，铭文中的族徽已不见。三是埋葬形制发生变化，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很少见有战国时期习用的椁棺间设置“头箱”“足箱”，腰坑、二层台等墓葬附属结构也逐步衰亡不见。四是同一区域居住和使用人群发生过转变，如广州覆盖顶岭和罗泊湾汉墓的墓主人为越系人群，担任王朝臣属，而这一带的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墓地族属却多为次生越人，暗示区域内人群主体的变化。同样的现象亦见于增城浮扶岭一带，M511器物组合以越式为主，融入汉风，年代在南越国早期，一般认为是较为单纯的越人墓地。而近年广州西湾路石冢发掘的墓葬常见叠加式棺椁，汉式玉器，墓葬年代在西汉早期，表明该区域在西汉前期已经成为普通越人集中居住的区域。该墓以平民级、城区内、越人的特质现象反映出其与同区域汉人墓对照，清晰呈现汉越共存、渐进融合的基础图景。五是西汉南越国国家族墓在不同时期具有分布规律，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且多元，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特点。西汉南越国地区考古材料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诸多变化，表明西汉南越国墓葬不仅存在层级分明的社会分层，而且阶层流动与重组现象已经发生，其间既有当地越人对中原汉文化礼制习俗的转变，又有南下汉人次生越化的现实，也伴随着不同族属群体间物质财富及人口等方面实力的消长变迁。

社会生产的专业化与分工

根据西汉南越国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结合南越王官署遗址、广州第一人民医院遗址、贵城遗址、北流铜石岭铸铜地点等多个地区手工业作坊遗存或器物的发现，可大致勾勒出西汉南越国社会生产的面貌。作为南越国时期政治中心的都城番禺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与贸易发展均衡，有相当比重的农业生产和通商贸易是该地区不同于中原和关中地区的特点。在手工业生产门类中，都城番禺地区制陶业和冶铸业是比

较发达的产业，农业、贸易商业相对发达，可能是农业经济广泛开展的基础。都城番禺地区看似与郡县城邑定位不匹配的农业生产和商贸生产活动的存在，却在各类社会生产之间形成了彼此互相关联的类似产业链的依附关系，相较而言，南越国制陶作坊数量比同时期的闽越等地区多很多。南越国靠近珠江口的沿海地带，存在以珍珠采集、海上香料加工为主要的特色作坊。都城番禺地区除冶铸业生产发达以外，其余手工业生产门类基本齐全，显现出均衡发展的局面，包括官营纺织生产、石制品生产、漆器生产、度量衡和武器生产等。这些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规模不等，以大型作坊为中心形成岭南地区手工业从萌芽到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与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岭南地区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渔猎业生产工具非常多，说明其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比较大。

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农业、渔猎业与手工业中的玻璃制造业和制陶业形成了一种产业链式的共生关系，也是数个郡县中唯一农业和渔猎业占比较高的治所。都城番禺地区主要发展手工业，各种手工业门类均衡发展，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形成手工业生产片区。同时，桂林郡地区也在发展手工业生产中可能设有官营冶铁作坊，其与南海郡地区在生产结构上似乎形成了互补和依附关系。南越国时期多个郡县在社会生产上各有侧重，南越国南海郡地区是手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综合发展的经济中心，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有相当一部分为南下汉人。西汉南越国时期主要生产门类形成农业纺织+制陶冶铸模式，而交趾郡越南北部地区则主要发展制陶和竹木业。

基层社会组织以郡县制为框架、汉越双轨治理为核心

从现有资料出发，探讨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可以郡县制为骨架梳理南越国时期人群构成、阶层构成和社会生产情况。这些相关联的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探讨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需要综合考虑族属、阶层、社会生产与分工、单纯从墓葬材料出发，以血缘或地缘来解释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已无法匹配当时社会的复杂情况。

南越国继承秦代“郡县制”，在中原移民集中的区域（如番禺、龙川等核心城市周边）推行乡一里一什伍的基层行政体系。被迁置在南越国都城的部分南下汉人，脱离了土地，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匠人，由赵氏政权直接控制，他们生前的生产、生活中在“里”中，死后其埋葬形式呈现出汉越融合、分层演进的特征，既吸收了原生越人葬俗的文化底色，又保留中原土葬礼制，形成多元并存的丧葬体系。在西汉南越国前期，南越越氏政权将南下汉人迁置南越国都城番禺，采用“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而越人基层以血缘为纽带，共同拥有土地（“佃田”），集体耕作、平均分配，保留“断发纹身”“鸡卜”等传统习俗，通过祭祀（如祭龙母、祖先）强化氏族凝聚力，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继续保持。次生越人在居葬形式上应有专门的居住区、专门的墓地、专门的田地或山林，贵族能够受封土地用以农业生产，高级贵族有自己的土地。西汉南越国时期次生越人和土著越人在管理形式上的区别逐渐分明，随着南下中原人与地方土著越人逐渐融合，南越人以血缘为组带的宗族组织逐渐向地域性转变，保留中原“汉式”葬俗的墓葬出现在南越人墓地中。从历史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资料看，西汉南越国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为“雒将”。“雒将”是兼具军事和行政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层级结构，担任雒将职位的人物以越人为主，西瓯、骆越等越人以氏族公社为基层单位，首领称“雒将”（或“雒侯”），掌管部落生产（如“佃田”的集体耕作），内部纠纷及对外联络。

融合了南下汉人和越人的地域性基层社会组织在南越国的出现，是中原制度与岭南越人传统深度融合的二元结构，核心围绕“和辑百越”政策展开，呈现“行政统辖+血缘/部落自治”的双层格局，是在中原移民与岭南土著越人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伴随南下汉人与当地越人的融合，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秦汉时期，随着越地民心、身份认同的转变，以血缘为纽带的岭南氏族组织被打破，土著越人与汉人埋葬于同一墓地中，相应的，在居住形式上，也出现中原南下汉人与岭南本地越人杂居也有分地的现象，此时基层社会组织已经不再单纯以血缘为纽带，真正具有了地域性性质。

【本文系贺州学院南岭民族文化旅游研究院课题“秦汉时期南岭走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5KF1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贺州学院】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 宸 丁淑娟

交流

以青春之姿，探历史之秘——考古实习行思录

阿如恒

聊城篇

时光荏苒，距离聊城考古实习结束已逾数月，可那段盛夏里的田野时光，至今回想仍历历在目。我们的实习筹备之初，恰逢期末复习的紧张阶段，我与包智慧始终惦念着考古发掘的实践机会，一次次向班主任询问，能否参与工地发掘或室内文物整理工作。2025年6月20日晚，老师的消息如约而至：“给了我们4个实习名额，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坚持到底。”看到消息的瞬间，满心的兴奋难以按捺，我当即答应下来，脑海中已然浮现出田野工地上的种种场景。

7月5日，我们一行四人抵达聊城。7月7日，正式开启了田野发掘工作。由于对考古发掘流程尚不熟悉，师兄安排我们两人一组进行协作，待熟悉流程后再独立负责探方。我与包智慧同学结为一组，在后续的工地上，她成了我最得力的搭档。智慧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从不言累，更常在劳作间隙主动接过工地协助的大爷大妈手中的铁锹，默默帮忙铲土。我们配合默契，进展顺利时，一天便可完成一座墓葬的清理；若遇结构复杂者，则需沉下心来打磨四五日。她常笑说：“真碰到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份纯粹的热情，时时感染我。工地上人来人往，手铲时常常杂难辨。为免找寻之烦，我在铲柄上刻了个“阿”，智慧则刻了个“包”，自此“阿包组合”便成了我们在工地的代号。

聊城的夏日实在难熬。干热的风卷着地气扑面而来，难得一丝凉意。汗水从早淌到晚，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幸得工地上的赵老师不时送来雪糕、冰镇柠檬水，偶尔还有清甜的黄桃，为这段汗水浸透的日子添上些许凉意。

当我在M60墓葬中亲手清理出“至和元宝”与“治平元宝”时，指尖传来的触感让北宋年间的市井喧嚣仿佛在耳畔苏醒——这种与历史直接“对话”的震撼，是任何文献记载都无法替代的。而随后整理M19墓葬资料的经历，则让我对考古工作的认知产生了根本转变。在手绘墓葬剖面时，由于对绘图规范不熟又急于求成，我接连犯下图纸比例失调、方位标注错误等基础失误。在老师“考古学的科学性就藏在毫厘之间的‘严谨里’”的提醒中，我终于明白：地层不会说谎，但粗糙的记录会让真相变形。从此，“测量三次再下笔，核对两遍再提交”成为我在探方里默念的工作准则。那些看似繁琐的绘图步骤，正是考古人为历史真相构筑坚实的线索。

工地上紧张有序的工作氛围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师生之间、同侪之间家人般的关怀。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指导与安排，想方设法

为我们改善伙食，解决困难，不辞辛劳地在各个探方间奔波指导……老师们不仅传授了专业知识，更以身作则展示了考古人踏实、坚韧、温暖的品格。当聊城实习接近尾声，一场欢送会将所有温情凝聚，如果时光能再慢些，该有多好。这段充满汗水与欢笑夏日，终将成为我们考古道路上最珍贵的回忆。

聊城的烈日，能将汗水瞬间蒸发。但正是在这38℃的静默里，我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我喜欢蹲在探方里，一凿一铲地清理泥土，想象着古人生活的一举一动。哪怕没有收获，我也享受这个过程，热爱这样的生活。考古的魔力，或许就在于这种矛盾的统一：用最艰苦的体力劳作，抵达最深邃的精神平静。

从青涩生疏到逐渐熟练，从依赖伙伴到独立负责，这段日子记录了我的专业启蒙与个人成长。更重要的是，初步树立了团队协作意识，培养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并坚定了在考古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感谢老师们提供的宝贵机会，感谢聊城工地所有师友的指导与陪伴。这段充满汗水、温暖与发现的夏日记忆，我将永远珍藏。

鹿泉篇

或许是暑期田野上的表现得到了认可，2026年寒假，我有幸再次开启了另外一段实习的旅程。元旦当天，我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鹿泉区的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整理基地。初到基地，我便被这里的氛围深深打动——大家都怀揣着对考古的满腔热血，为热爱奔赴，乐此不疲。我也深受这份热情感染，迅速融入了这个集体。还记得刚踏进基地时，一眼望见排列整齐的器物，还有热情接待我们的学长学姐，那一刻便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有温暖的人间情怀。

如果说聊城教会我们与泥土对话，那么鹿泉则教会我与时间谈判。实习前期，我们学习使用PS软件进行墓葬绘图。这看似简单的线条勾勒，实则需要极大的耐心与严谨——器物轮廓的精准描绘、剖面与平面对应关系，每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

面对复杂的结构图，我常常手忙脚乱。幸有学长悉心指导，无论问题多么基础，他总是耐心讲解，亲自示范。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从线条歪斜到落笔精准。

除了动手实践，老师特意邀请了几位学界专家前来授课，每一次讲座都像是一场知识的盛宴。黄信老师带来的关于邢窑白瓷的讲座，让我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南青北白”中那抹如银似雪

的北方白瓷之美。从容口的分布到工艺的演变，从器型的流变到釉色的审美，千年前的窑火重现在我们眼前。张文瑞老师关于东垣古城的精彩讲解，则带我们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探秘之旅。东垣古城是石家庄城市文明的起点，它的历史地位和考古价值非常重要。张老师把他多年的考古发现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勾勒出一座繁华古城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从城墙的奔跃到城里的布局规划，从出土文物的种类到历史文献的记载，每一个发现都像一块拼图，慢慢地拼出了这座千年古城过去的辉煌样子。

在这段时光里，我学到了许多实用的专业技能，从如何制作一份合格的PPT，做好规范的文件管理，到上手完成墓葬绘图，每一项收获都让我倍感充实。我也满心期待下次再来时，能继续学习器物绘图、器物拍照、器物拼对与修复等技能，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让专业力量更上一层楼。

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我逐渐读懂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你只管向泥土深处耕耘，答案自会在时间里浮现。

这份体会，在制作铜钱拓片的过程中变得格外具体。初次接触拓片处理时，我按照步骤操作，却因生疏而进展缓慢。好不容易完成一张，效果却透着“匠气”。学长学姐轻声提醒：“不妨放下复杂的工具，回到最朴素的触感。”我放下急于求成的心理，重新对照实物，一遍遍调整角度与光线，终于做出了第一张“有呼吸”的拓片。

然而，考古学的标准永无止境。次日提交成果后，学姐指出连接线勾勒中的细微不一。于是我们再次伏案，屏息凝神，直至每一条线都遵循同一套“语法”。当所有拓片最终通过审核时，我望着那些清晰的纹样，忽然懂得：考古所要求的“认真”，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完成，那是在反复的“否定—重建”中，让技艺无限趋近于真实。那些看似琐碎的磨砺，正是我们与历史对话时，最扎实的语法基础。

除了专业能力的提升，这段鹿泉实习经历，更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方向有了清晰的认知，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考古专业深耕不辍的决心。实习的旅程虽已告一段落，但成长脚步从未停歇。未来，我会带着聊城与鹿泉两次实习赋予我的勇气、智慧与力量，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始终怀揣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与初心，在专业道路上不断探索、精进，努力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也愿这个温暖的考古集体越来越好，愿每一位为考古事业奔赴的人，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不负韶华。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古典学系本科生）